

劳动力供给转变 与资源配置效率的关联度^{*}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ange of Labor Supply and the Efficiency of Resource Allocation

屈小博 程 杰

内容提要 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转移带来的配置效率改善是促成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因素,但这一积极作用正在消失。通过政策调整提高劳动参与率、挖掘劳动供给潜力,是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提高劳动参与率、挖掘劳动供给潜力,应深化劳动力市场制度改革;继续提升劳动力市场效率;改革社会保障制度,使之与劳动力市场相适应;增加人力资本存量、提高人力资本质量,使劳动供给能够适应经济结构转变需求。

关键词 劳动力迁徙 人力资本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作者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 北京 100028

Qu Xiaobo Cheng Jie

Abstract: Allocative efficiency improvement derived from labor mobility from agriculture to nonagricultural sector is an important factor of sustainable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However, the function of this key factor is gradually disappearing. To improve labor participation rate and explore potential labor supply by adjusting the relevant policies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content of the current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We should deepen reform of labor market system, further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labor market, reform social security system adaptable with labor market, increase the stock of human capital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human capital so that the labor supply can adapt to the change of economic structure.

Key words: labor migration, human capital, escaping the middle-income trap

劳动力向城镇和非农迁移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之一,经济产出的增长来源于劳动力供给的不断扩大。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一个很大挑战就是劳动力成本的快速上升压缩了结构调整期所需要的时间。一方面,以往经济结构中,依赖生产要素积累的方式推动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小。另一方面,生产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将诱导企业向生产要素相对稀缺方向进行技术变迁和转型升级。^[1]但是,这种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是需要时间的,在新的增长方式和增长源泉没有建立起来、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没有完成之前,劳动供给的短缺和劳动力成本的快速上涨,可能使我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因为工资上涨是

* 该标题为《改革》编辑部改定标题,作者原标题为《迁移、劳动参与率与挖掘劳动供给潜力》。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应急管理项目“中等收入阶段的人力资本积累研究”(批准号:71642003)。

由市场决定的,政策调整都无法干预,但是供给因素是可以通过政策调节的。这里通过相关数据分析我国劳动力迁移的典型事实、劳动力供给的最新变化和特征,讨论如何通过改革发挥制度红利以提高劳动参与率,充分挖掘劳动供给潜力。

一、劳动力供给与经济增长源泉

我国在进入刘易斯转折点之前,由于农业部门劳动的边际生产率水平较低,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部门的转移就可以带来配置效率的改善,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然而,由于劳动供求转变的变化,由劳动力再配置带来的经济增长份额已由改革开放前20年的每年20%~25%下降到2007~2012年的每年约10%(都阳等,2014)。根据对经济增长来源中劳动贡献的分解也可以看出,劳动供给对产出增长的贡献正在出现明显的减弱,其中,劳均产出代表劳动生产率,劳动年龄人口代表劳动供给总量,劳动参与率代表劳动力资源的有效利用程度。同时,代表劳动供给总量的劳动年龄人口对产出增长的贡献呈现单调减弱趋势。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充分体现了经济增长从二元经济时代向新古典阶段转变的一般性特征(蔡昉,20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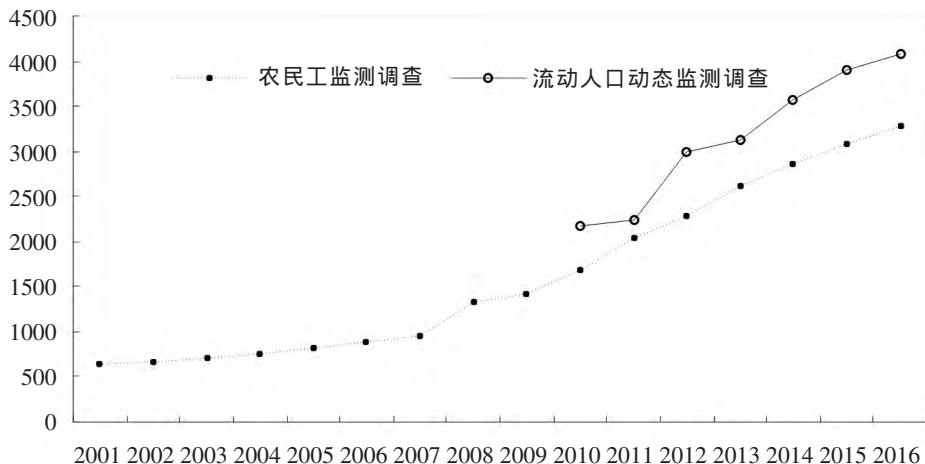
我国跨越刘易斯转折点之后呈现出了工资增长、工资趋同与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趋势性特

征。^②这种趋势给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带来了较大的挑战。2009年以来,由于劳动力短缺的频繁出现,普通工人的工资及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显著呈加速化趋势(蔡昉,2010)。以农民工工资为例,图一是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数据反映的

2001~2016年农民工工资变化趋势,年均名义工资增长率为11.5%。分阶段来看,2001~2006年农民工平均工资的年复合增长率为6.7%,而2007~2014年的年复合增长率达到13.1%。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也反映出同样的趋势,2010~2016年农民工工资名义增长率平均为11.0%,呈现出快速的工资上涨趋势,最近两年伴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结构调整加深,农民工工资收入增长放缓。这不仅意味着城乡间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在逐步提高,同时也表明了农村富余劳动力已经转移殆尽,进一步的劳动力转移所带来的配置效率改善也将逐步下降。

工资水平的上涨,必然推动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而一旦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快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竞争优势就会下降。根据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度量了制造业部门就业的劳动力成本,计算出2001~2012年我国制造业单位劳动力成本变化情况^①,发现在我国经济达到刘易斯转折点后,单位劳动力成本就呈现非常明显的上升趋势。2004年,我国制造业单位劳动力成本水平约为美国的31%,到2012年上升至40%。而同期一些主要制造业大国的单位劳动力成本呈下降趋势。虽然整体水

^①单位劳动力成本,即工人的平均劳动力成本与平均劳动生产率之比,就是衡量这一趋势的重要指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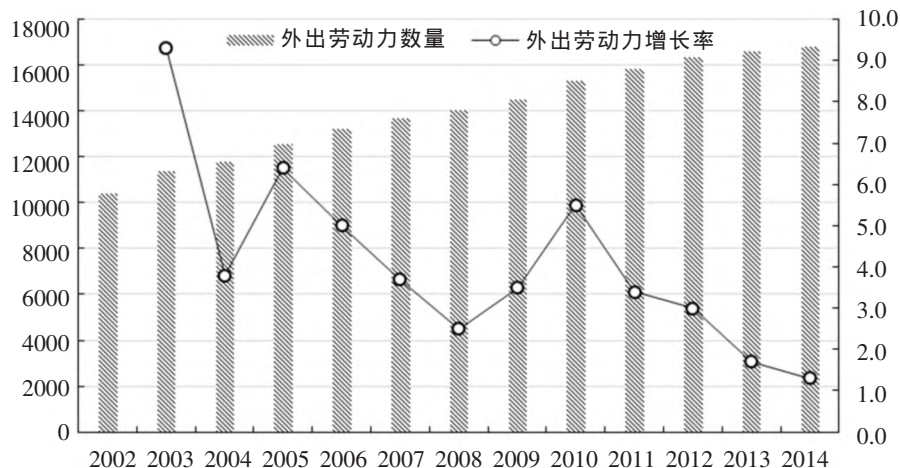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农民工监测调查数据和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计算。

平上,我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仍然存在,但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预示着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减弱,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则需要积极应对。无疑,增加劳动供给是延缓劳动力成本上升的速度是现实的选择。

二、我国劳动力迁移、劳动供给与劳动参与率变化

我国劳动力大规模向城市迁移开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逐步进行的城市经济改革,这为农村劳动力流动进一步创造了制度环境。我国正式加入 WTO 以后,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有了飞速发展,也更加剧了非农部门对农业转移劳动力的需求。进入 21 世纪以来,又进行了一系列户籍制度改革,作为一系列制度变革和政策调整的结果,农村劳动力流动规模日益扩大,形成“民工潮”。图二给出了 2001 年以来从农村迁移到城镇并且居住半年以上的人口及其年增长率。2001 年,这一数字仅为 8000 万人,到 2008 年迅速增长到 1.4 亿。尽管 2008 年受金融危机影响,年底一些农民工因失去工作返乡,但之后随着就业形势的好转,大部分农民工又返回城市。不仅如此,还有一些从未外出的农村劳动力,也加入到进入城镇就业的行列。2009 年,从农村迁移到城市的人口达到 1.45 亿人。2014 年农村迁移外出人口规模达到了 1.68 亿人。同时,从过去 15 年的农村外出劳动力增长率变化趋势来观察,外出劳动力从农村向城镇转移就业的增长已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到 2014 年农村外出劳动力增长率仅为 1.3%,这表明每年从农村转移的劳动力数量已经呈现明显下降趋势,城镇新增劳动力的供给在逐渐减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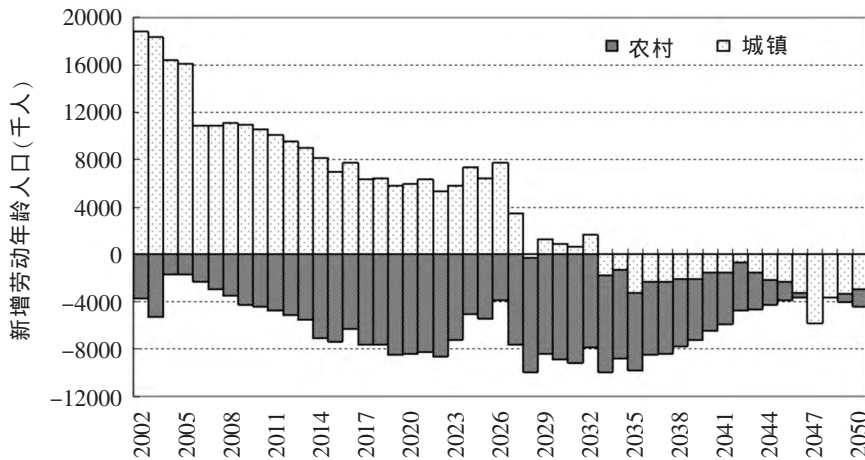
图二 从农村迁移到城镇且居住半年以上的外出人口数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农村住户调查数据计算。

随着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趋缓以及就业扩大对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吸收,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已经消失。2010 年,作为劳动力供给基础的劳动年龄人口就开始呈现明显的增长递减趋势,2012 年之后,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开始下降(见图三,下页)。这与联合国人口预测(United Nations, 2010)的劳动力年龄人口的变化趋势是一致的。根据国家统计局人口变动抽样调查,2012 年开始,劳动年龄人口(16~59 岁)总量开始减少,2016 年较 2015 年减少了 349 万^①。可以说人口结构转变是推动我国劳动力市场变化重要而又独特的因素,这与近年来发达国家以技能偏向的技术变迁所诱发的劳动力市场变化有着很大不同^[3],因为这是供给侧因素的变化。利用 2010 年人口普查数据资料所作的从农村向城镇的流动人口预测表明,近年来,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已经是负增长,而城镇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越来越依靠农村流动人口。2015 年,城镇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量小于农村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量。

从可供外出就业的数量看,如果非农部门的需求和劳动力市场的制度因素不出现大的变

^①这一变化也解释了近年来劳动力市场的主要趋势:虽然经济增长下降,但劳动力市场基本稳定,失业率维持相对低位的水平。



图三 我国城镇和农村新增劳动年龄人口的预测变化

化，农业中可转移就业的劳动力数量已经非常有限。并且，未来城镇所需的劳动力主要由农村转移而来，因而城镇新增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在2028年以前都是净增加的，农村新增劳动年龄人口则由于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一直是负增长。到2028年以后城市和农村的新增劳动年龄人口都将绝对减少，这一预测趋势与未来2050年我国总人口和总的劳动年龄人口呈现的倒“U”型趋势一致。不仅如此，根据人口普查数据来源的统计结果，16~19岁和20~29岁的年轻劳动力虽然受教育水平较高，但未转移的数量已经非常有限。

一方面，由于劳动力流动是农村人口迁移的主导形式，年轻人口已成为农村人口迁移的主力军。根据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资料（见表1），与农村从业劳动力相比，外出农民工的年龄构成更加年轻。在外出农民工中，16~20岁、21~30岁、31~40岁、41~50岁和50岁以上的比例

表1 农村外出劳动力非农供给的年龄分布(单位:%)

年份	16~20岁	21~30岁	31~40岁	41~50岁	50岁以上
2008	10.7	35.3	24.0	18.6	11.4
2009	8.5	35.8	23.6	19.9	12.2
2010	6.5	35.9	23.5	21.2	12.9
2011	6.3	32.7	22.7	24.0	14.3
2012	4.9	31.9	22.5	25.6	15.1
2013	4.7	30.8	22.9	26.4	15.2
2014	3.5	30.2	22.8	26.4	17.1
2015	3.7	29.2	22.3	26.9	17.9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农村住户调查数据计算。

2008年分别为10.7%、35.3%、23.8%、18.6%和11.4%；2015年分别为3.7%、29.2%、22.3%、26.9%和17.9%。21~30岁、31~40岁、41~50岁年龄组的劳动力比重相对较高，并且青年农民工的比重（21~30岁）是所有年龄组最高的。但是，青年农民工所占比重从2008~2014年的35.3%下降到

30.2%，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的青年劳动力比重从2011~2015年的34.4%下降到33.1%（见表2，下页），这表明流动人口的劳动力年龄结构与劳动年龄人口结构的变化及未来趋势是相吻合的。非农劳动力市场对年轻劳动力的选择性，是推动我国劳动力市场出现“刘易斯转折点”的重要原因。因此，实际上，迁移的人口统计特征也受到农村老龄化趋势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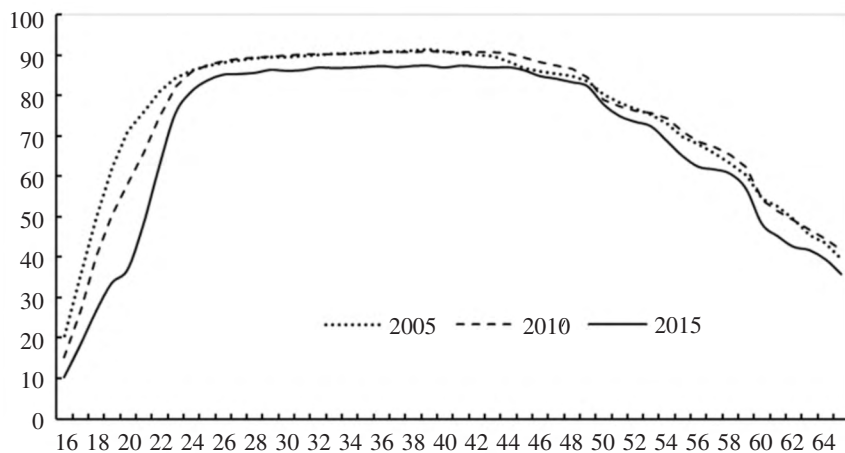
另一方面，尽管劳动力市场倾向于选择年轻劳动力，但农村人口的老龄化，使得外出的人口开始呈现老化的特征。根据国家统计局的住户调查资料和国家卫计委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由于农村人口中相对年轻的群体流动到了城市，如表1中住户调查数据2008~2015年50岁以上的农民工比重从11.4%上升至17.9%；表2中的流动人口劳动力比重由3.44%上升至9.52%，这表明农村未转移的劳动力中相对年轻群体越来越少。这种趋势的一个

表 2 流动人口劳动力非农供给的年龄分布 (单位:%)

年份	16~20 岁	21~30 岁	31~40 岁	41~50 岁	50 岁以上
2011	6.96	34.40	35.03	20.17	3.44
2012	6.39	34.51	33.69	22.00	3.41
2013	5.93	33.90	33.33	22.75	4.09
2014	5.31	34.03	32.06	22.74	5.85
2015	4.59	33.10	30.05	22.73	9.52

注:本表统计比重既包括农村向城镇的流动人口,又包括城镇之间的流动人口。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卫计委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 2011~2015 年微观数据计算。



图四 不同年龄劳动参与率的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 2005 年 1%人口抽样调查、2010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2015 年 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计算。

结果是:当前的农村人口结构更加失衡——常住人口的老龄化程度可能远远高于户籍人口的老龄化水平。

上述劳动力非农供给的结构特征是劳动供给的结果,这种结果的一个主要来源就是劳动参与率的变化。劳动参与率构成来自每一个年龄组劳动参与率的变化以及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根据人口普查微观数据计算的不同年龄劳动力劳动参与率变化情况(见图四)可以看出,总体上,目前的劳动参与率比起 10 年前和 5 年前均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这一特征必须高度重视。这里虽然有一定程度的老龄化因素,但主要原因源自结构调整引起的劳动力技能不能满足新增就业岗位和就业需求,因为 2015 年 25~45 岁年轻劳动力的劳动参与率明显低于 2010 年

和 2005 年。同时,图四分年龄的劳动参与率变化特征也说明,目前广泛讨论的延迟退休并不能有效增加劳动供给,因为 55 岁以上劳动力的劳动参与率明显低于非学龄人口,而且 2015 年劳动参与率较 2010 年、2005 年人口普查下降得更快。这说明年龄较大的劳动群体面临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技能提升挑战,更容易退出劳动力

市场,增加劳动供给不能针对当前的临近退休年龄人口,而应当提升相对年轻一代劳动力的人力资本质量,增加有效劳动供给是政策应对的当务之急。

为了和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资料公布的分年龄组的农村外出劳动力供给进行比对,并作一致的分析,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也按照表 2 相同的年龄组划分,分性别观察流动人口就业率、劳动参与率,以反映劳动供给的最新变化。从表 3(下页)可以观察到如下特征:第一,流动人口劳动力中所占比重最高的三个年龄组为 21~30 岁、31~40 岁、41~50 岁,其就业率和劳动参与率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都高于其他年龄组;第二,16~20 岁、21~30 岁、31~40 岁、41~50 岁、50 岁以上年龄组的男性的就业率和

表3 2015年我国流动人口就业率、劳动参与率的性别差异

年龄组	就业率(%)		劳动参与率(%)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16~20岁	76.14	71.21	81.43	76.89
21~30岁	92.62	72.04	95.17	74.39
31~40岁	94.14	76.51	96.08	78.22
41~50岁	92.21	80.05	94.51	82.29
50岁以上	72.45	46.29	75.13	48.22

数据来源:根据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微观数据计算。

劳动参与率显著高于女性;第三,50岁以上年龄组的女性就业率和劳动参与率比其他年龄组低很多,这是因为50岁以上的女性流动人口在城市里退出劳动市场家庭照料的比重高,这点低于城市户籍女性的就业率和劳动参与率。由于流动人口是城镇新增劳动力主要来源,因此,通过制度供给和政策调整,比如扩大户籍和社会保障覆盖流动人口,增加流动人口的劳动参与率,是短期增加劳动供给的有效途径。

三、劳动参与率的决定因素与劳动供给

劳动参与率是衡量劳动年龄人口参与经济活动状况的主要指标,劳动参与率变化除了与经济增长、人口结构转变等宏观经济变量密切相关外,其微观决定因素亦是劳动力供给政策调整的依据。这里采用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回归估计影响劳动参与的概率模型,来分析影响劳动参与率变化的劳动者个人决策和个人特征。劳动参与的选择模型采用Probit^①,因变量为是否劳动参与的0、1变量,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和户籍等反映劳动者个人人口学特征的因素^[4];另一方面,从劳动供给的微观决策来看,劳动参与还受家庭规模、家庭成员受教育程度等家庭特征的影响。^[5]不仅如此,我国区域发展经济不平衡的特征明显,在不同地区或家庭,就业、劳动参与率与劳动年龄人口比率有密切相关关系,并且与老龄人口比率也有相关关系。因此,在回归估计时还相应控制了家庭平均人口数、家庭平均受教育程度、家庭平均年龄以及不同年龄组和地区等虚拟变量。

表4(下页)是回归估计的劳动参与决定因

素Probit模型结果,从中可以发现:第一,与表3的统计性描述结果一致,流动人口中男性的劳动参与可能性要显著高于女性。第二,已婚劳动参与决策有显著负向效应,这与一般理论和实证检验相一致,并且,流动人口监测样本中,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低于男性,尤其是已婚的女性劳动参与较低。第三,农村流动人口劳动参与的可能性显著高于“城-城”流动人口的劳动参与,这与实际观察和统计性结果也是一致的。第四,以16~20岁年龄组为参照组,相对于16~20岁、21~30岁、31~40岁、41~50岁年龄组的劳动参与估计系数显著为正,高于16~20岁年龄组,在4个估计模型中结果一致,并且非常稳健。只有50岁以上年龄组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低于16~20岁年龄组的劳动参与。这说明年龄较大的劳动群体退出劳动力市场的可能性更大。第五,以小学及以下受教育程度为参照组,表4的估计结果显示,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对流动人口劳动参与的可能性有非常显著的正向效应,并且在控制了家庭平均人口数、家庭平均受教育年限、家庭平均年龄等家庭特征变量后,估计结果非常稳健。表4中初中、高中、大专、本科、研究生的回归系数依次提高,表明对劳动参与的正效应逐次提高。这一结果有非常重要的政策含义,表明注重和提高流动人口的素质和受教育水平,对提高和挖掘劳动供给潜力具有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因此,加强提高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积累政策调整非常必要。

从经济发展空间分布视角观察,劳动参与率和就业率与我国经济发展的空间分布相吻合。根据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2015年全样本微观数据计算的就业率和劳动参与率在地级市层面呈现基本的“正态分布”态势,属于比较均匀的分布。无论是东部地区还是西部地区地级城市的就业率、劳动参与率都有较高、较低

^①Probit模型是劳动参与选择实证分析中经济学常用的一种方法,因此,这里不作方法和模型估计的描述,只报告估计结果。

表4 流动人口劳动参与的决定因素(Probit 模型)

解释变量	(1)	(2)	(3)	(4)
性别(男性=1)	0.7989***	0.7997***	0.8077***	0.8010***
婚姻(已婚=1)	-0.2876***	-0.1735***	-0.1858***	-0.2884***
户籍(农业=1)	0.4375***	0.4527***	0.4620***	0.3820***
16~20岁	—	—	—	—
21~30岁	0.3927***	0.3557***	0.3488***	0.3843***
31~40岁	0.6432***	0.6279***	0.6341***	0.7486***
41~50岁	0.7028***	0.6830***	0.6610***	0.9846***
50岁以上	-0.4889***	-0.5491***	-0.5615***	0.0572***
小学及以下	—	—	—	—
初中	0.1309***	0.1127***	0.0555***	0.0891***
高中	0.1889***	0.1642***	0.0520***	0.1449***
大专	0.3176***	0.2888***	0.1158***	0.2846***
本科	0.4620***	0.4374***	0.2386***	0.4526***
研究生	0.7318***	0.7103***	0.4577***	0.7321***
家庭平均人口数	—	-0.0889***	-0.0817***	-0.1128***
家庭平均受教育年限	—	—	0.0260***	0.0006
家庭平均年龄	—	—	—	-0.0212***
地区虚拟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0.0424**	0.1769***	-0.0146	0.8713***
似然比	-80881.08	-80571.19	-80507.55	-79632.22
Pseudo R ²	0.1562	0.1594	0.1601	0.1692
观察值数	207897	207897	207897	207897

注:使用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2015年微观数据全样本估计。*、**、***分别代表在10%、5%和1%水平上显著。

的分布,就业率和劳动参与率比较高的是大城市、经济发达和劳动力流入的城市。需要说明的是,就业率和劳动参与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城市,基本上属于人口净流出的城市,这里面包括两类城市:一类是跨省迁移的人口净流出城市,一类是向省内发达城市迁移的人口流出城市。其中,东部地区就业率和劳动参与率较低的城市多是属于第二类城市。这说明劳动参与率可以观察劳动供给的时间空间上的趋势性特征。因此,考察地级市层面的劳动参与率决定机制更有助于增强政策调整的针对性。

表5(下页)、表6(下页)是用全国流动人口监测调查数据和OLS回归估计的2015年全国地级市层次流动人口就业率和劳动参与率的回归估计结果,从中可以观察到,地级市层面上,男性的就业率、劳动参与率显著高于女性。受教育水平的上升可以显著提高地级市层面的就业率,同样,包含“城-城流动”样本的回归结果也

显示,受教育程度对提升流动人口劳动参与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表5、表6显示,无论是农村流动人口还是全部流动人口,平均受教育年数增加1%,地级市层面的就业率和劳动参与率平均会增加6~7个百分点。老龄化对城市层面的劳动供给负面影响显著,60岁以上人口比率每上升1%,分地区的农村流动人口和“城-城流动”样本的流动人口劳动参与率分别下降1.5个、1.7个百分点。因此,为了避免劳动参与率下降给地区劳动力供给带来的不利影响,仅靠延迟退休年龄可能难以起到增加劳动供给的效应,但是消除对女性的就业、晋升、待遇等方面的制度性歧视,可以提高女性的就业、劳动参与率。同样,大力发展教育,增加人力资本积累,能显著促进地级市层面就业率水平的进一步提高。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数据所限,在回归估计中无法估计地级市城市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等因素对劳动参与率的影响,但是社会保障制度设

计和保障水平是“双刃剑”^[6],既可能促进特定群体劳动就业,也可能对劳动供给产生挤出效应。

四、挖掘劳动供给潜力的政策调整策略

我国正处于人口与经济结构转型的关键阶段,从要素驱动型转向效率驱动型的增长模式转变尚未完成,努力挖掘尚存的潜在劳动资源,积极为经济结构转变赢取时间,减少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冲击,是当前特定发展阶段政策应对的现实举措。在现有农村可供转移劳动力殆尽、劳动年龄人口总数减少等约束条件下,通过政策调整提高劳动参与率、挖掘劳动供给潜力,是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有之义。

第一,深化劳动力市场制度改革,着力提高劳动参与率,延续我国经济竞争优势。劳动供给主要取决于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和劳动参与率,前者受制于人口结构长期变化,已经无法成为劳动供给主要贡献,劳动参与率变化成为决定劳动供给的主要因素,是挖掘劳动力潜在资源的主要渠道,也是保持经济潜在增长的主要来源。以户籍制度为抓手深化劳动力市场化改革,有助于提高劳动参与率,稳定城镇劳动供给水平,同时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提升人力资本质量与利用率,优化资本积累与劳动供给的结构,能够推动经济增长动力转换,预计可以将“十三五”时期我国潜在增长率从6.2%提升到7.0%左右。^[7]若“十三五”时期全面、彻底地推进户籍制度改革,预计能够带来1~2个百分点的潜在GDP贡献(都阳等,2014)。户籍改革收益非常可观,改革成本也完全可控,中央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建立合理的成本分摊机制是推动户籍改革顺利实施的关键所在。^[8]

第二,继续提升劳动力市场效率,挖掘劳动力供给潜力。加强劳动力市场保护、保障就业和民生的底线思维,对于维持社会稳定是必要的,但同样十分重要,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建设一个高效的劳动力市场对于我国经济成功转型具有关键意义。一方面,要利用劳动力市场总体平衡的有利时机促进就业结构转型升级。根据不同经济体在不同发展阶段就业结构变化的国际经验^[9],中等收入阶段后期,经济结构会呈现多元化趋势,我国已经迈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经济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多元化趋势将进一步加速,要促进就业结构向多元化方向转变。另一方面,要注重提高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经济结构的转型,从某种程度上说是生产要素的再配置过程,灵活有效的劳动力市场将助

表5 2015年地级市层次流动人口就业率的决定机制(OLS)

解释变量	农村流动人口	流动人口
常数项	31.26	34.26
男性比例	0.212**	0.203**
平均受教育年数	6.785**	6.336**
平均受教育年数平方	-0.375	-0.478
16~59岁人口比例	0.512***	0.507***
60岁及以上人口比例	-1.012**	-1.433*
东部地区	-1.813	-1.302
中部地区	-1.160	-1.206
样本数	333	333
调整后 R ²	0.470	0.403

注:使用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2015年微观数据全样本估计。*、**、***分别代表在10%、5%和1%水平上显著。

表6 2015年地级市层次流动人口劳动参与率的决定机制(OLS)

解释变量	农村流动人口	流动人口
常数项	25.04	31.59
男性比例	0.192**	0.183**
平均受教育年数	7.143***	6.634***
平均受教育年数平方	-0.429	-0.542
16~59岁人口比例	0.674***	0.636***
60岁及以上人口比例	-1.522**	-1.769**
东部地区	-2.233	-1.761
中部地区	-1.431	-1.107
样本数	330	330
调整后 R ²	0.575	0.510

注:使用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2015年微观数据全样本估计。*、**、***分别代表在10%、5%和1%水平上显著。

推经济的结构转型。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过程中的制约因素,将越来越来自于制度是否能刺激生产要素的有效供给,其中就包括劳动力要素的供给。因此,劳动力市场制度设计要更加注重对劳动供给的影响,鼓励个体积极地参与劳动力市场,提高劳动力供给的质量。

第三,改革社会保障制度,使之与劳动力市场相适应。人口老龄化步伐不可逆转,必须重视其对劳动供给和经济增长的影响,社会保障制度设计和保障水平应该尽可能地降低对劳动力市场的扭曲,尤其是对劳动供给的挤出效应,积极探索构建更加鼓励就业的社会保障制度,赋予个人更多地进入和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机会,将养老保障制度本身视为一个积极的生产要素。^[10]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切实降低企业经营成本,降低城镇社会保险缴费负担,鼓励更多中小企业和非正规就业人员参加保险,鼓励就业的社会保障体系应该基本覆盖所有劳动者。扩大劳动力总体规模和降低社会对老年人的供养负担,不宜仅仅在临近退休年龄人口身上做文章,而应创造积极条件,将当前这一代年轻人培养成拥有更充足人力资本的劳动者,使他们具备能力延长职业生命周期并提升生产效率。

第四,增加人力资本存量,提高人力资本质量,使劳动供给能够适应经济结构转变需求。我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优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普及义务教育战略,继续保持人力资本积累优势,将高中阶段纳入义务教育是必要且可行的。随着人口结构变化,高中阶段适龄人口总量在未来继续维持下降趋势,延伸义务教育并不会对公共财政带来多少增量压力。从劳动力市场匹配的角度看,中等职业教育由于人力资本的专用性强,造成结构性失业的风险也越高。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普通高中与通识教育所积累的一般性知识对于提高工人的创新性会产生更多的帮助,应该结合产业升级与劳动力市场的变化,调整中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中的比例关系,增加普通高中的毛入学率,奠定我国在未来

国际竞争中的人力资本基础。REFORM

参考文献

- [1]Barry Exchanger, Dongguan Park, Kwahu Shin. Growth Slowdowns Redux: New Evidence on the Middle -Income Trap, NBER Working Paper, 2013, No. 18673.
- [2]Cai Fang and Du Yang.Wage Increases, Wage Convergence, and the Lewis Turning Point in China,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11, 22(4): pp. 601~610.
- [3]Acemoglu, Daron. Technical Change, Inequality, and the Labor Market.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02, 40(1): pp.7~72.
- [4]严善平:《中国城乡就业率的变化与决定因素——基于 1988~2010 年中国城镇收入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劳动经济研究》2016 年第 3 期,第 83~102 页
- [5]Liu Qian. Unemployment and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in Urban China,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12, (23): pp.18~33.
- [6]Alan B. Krueger, Bjorn-Steffen Piche. The Effect of Social Security on Labor Supply: A Cohort Analysis of the Notch Generation,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1992,10(4): pp.412~437.
- [7]陈彦斌 刘哲希:《经济增长动力演进与“十三五”增速估算》,《改革》2016 年第 10 期,第 106~117 页
- [8]屈小博 程杰:《地区差异、城镇化与户籍改革成本的关联度》,《改革》2013 年第 3 期,第 37~44 页
- [9]屈小博 程杰:《中国就业结构变化:“升级”还是“两极化”》,《劳动经济研究》2015 年第 3 期,第 119~144 页
- [10]程杰 高文书:《“十三五”时期养老保险制度与劳动力市场的适应性》,《改革》2015 年第 8 期,第 84~95 页

(责任编辑:楚 渝)